

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

：從臺北二二八公園內

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說起



陳磅礪*



* 陳磅礪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臺灣神社據昭和七年（1932）《臺灣神社誌》載，共存三對石獅子，然目前相關探討文獻，多止於劍潭公園入口處獅子與圓山飯店前石獅兩對而已。其中明治三十四年（1901）板橋林本源所獻之石獅，論者多從板橋林家後人林衡道先生之說，認定即為圓山飯店前之石獅，對其餘兩對實際之歸屬亦未深究。然隨著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與臺灣神社關係之浮現，對於臺灣神社三對石獅之考據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嘗試參附筆者田野經驗搭配文獻資料，以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為主要論述之對象，期能對此三對石獅各自之歸屬達致些許之釐清。

關鍵字：臺灣神社、石獅、狛犬



前言

近來對臺灣日治時期神社之研究方興未艾，相關的論述成果日益豐盛，且對於神社狛犬之概況也已多所闡述。¹而筆者自民國九十三年以來即專注於臺灣石獅的調查研究，希冀藉由相關文物資料的匯整與紀錄，從其風格形態、雕工特色等來分析與釐清時代的脈絡發展，以及從明、清、日治、光復後與兩岸開放等不同階段所注入之新風格型制的轉變，來探究臺灣整體石獅工藝的發展歷程。也因此筆者對於許多無跡可徵的老石獅其年代與來歷格外關注。

而據昭和七年（1932）《臺灣神社誌》載，臺灣神社共有石獅子三對，然目前相關文獻多僅知有現存劍潭公園入口處與圓山飯店前之兩對石獅而已，另一對則被認為下落不明；且圓山飯店前之石獅一直以來皆被認定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板橋林本源所捐獻予臺灣神社之石獅。但隨著相關史料的逐漸面世，對於臺灣神社三對石獅之身份考據也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即以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為主要論述之對象，嘗試參附筆者田野經驗及文獻資料，期能對此三對石獅各自之歸屬達致些許之釐清。

雖然以日人立場而論，「狛犬」並不完全等同於我們所熟悉的獅子，但站在臺灣民間習慣的認知著想，日本狛犬的傳入，其實也是被歸納入「石獅」來理解，故國人常以「日本獅」稱謂，因無論其位置或功能皆與石獅子無異。同樣的情形可見於臺灣民間匠師雕刻敬獻的神社狛犬，日人多稱呼為「唐獅子」，唯此「唐」並非專指唐代，而為泛指中國漢民族流傳的型制風格。且實際上日人對於「獅子·狛犬」分際也相當混淆不清，如本文所提的三對神社「狛犬」，雖形貌各異，但在日人文獻《臺灣神社誌》中，仍名曰

1 如近來李榮聰先生發表多篇相關文章於《臺灣文獻》刊載。

「獅子」或「唐獅子」；而其中板橋林家所捐獻的一對更相傳為清代舊物，故本文仍以「獅子」一詞來統一稱謂。

一、臺灣神社石獅相關文獻

據昭和七年（1932）發行之《臺灣神社誌》記載，臺灣神社中奉獻石獅的紀錄有三，分別為：

明治三十四年 ……九月十三日 石造獅子 一對 板橋林本源²

明治三十五年 ……七月十三日 石造獅子 一對 在臺灣陸軍高等官³

昭和五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唐獅子 一對 臺灣總督石塚英藏⁴

目前文獻所述及的臺灣神社遺存之石獅，多為位於圓山大飯店廣場前以及劍潭公園入口處之兩對。其中除明治三十四年（1901）9月13日板橋林本源所獻之石獅，論者多從板橋林家後人林衡道先生之說，認定即圓山飯店前的這對石獅外，對於其餘兩對實際之歸屬尚未深究。如林衡道先生曾言：

當前臺灣神社的遺物，只有兩對石獅還可以看到。台灣神社的遺址上，現在建有圓山大飯店。該飯店門外大埕上有座牌樓，牌樓下一對石獅子，算是台灣神社的遺物。

這一對石獅子，石材是台灣的觀音山石，型態是中國南方形，姿態稍歪，並不端正，本來是置於板橋林本源五落新大厝門廳的一對獅子，是日治時期建立台灣神社時，日本政府勸林家奉獻的。林家五落新大厝，建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此一對石獅當是光緒十四年前後的古物。

另一對日本式石獅，現在移置在劍潭公園大門前，材質是「御影石」，

2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纂，《臺灣神社誌》，台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七年（1943）七版，頁114。

3 同注2頁115。

4 同注2頁129。

也就是日本兵庫縣一帶出產的花崗岩⁵。……。⁶

但是筆者翻閱國家圖書館2007年出版的《映像台灣系列1：日治時期的台北》，意外發現老照片中臺灣神社的一對石獅（圖3、圖4），竟然極似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的石獅！⁷讓困擾筆者多年的疑惑有所釋義，卻也牽一髮而動全身地全盤改寫了臺灣神社中石獅的相關論述！

二、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大石獅是否即臺灣神社石獅？



圖1 二二八公園內疑原臺北天后宮石柱珠



圖2 二二八公園內之急公好義坊及一旁大石獅

臺北二二八和平公園舊稱新公園，其原址曾豎立著清廷官建之臺北天后宮，其格局前後兩殿，護室高兩樓，正前方有堵大照壁，規模相當恢弘。⁸隨著日本人領台，因殖民統治、水土不服及衛生髒亂等多項問題，開展了各類市區整治工程，「市區改正」便為其中之主要政策。明治三十三年（1900）台北城內石坊街公告劃定為公園用地，明治四十一年（1908）初步落成，名為「臺北公園」或「新公園」。大正二年（1913），日本人拆

5 此處林衡道先生說法有誤，御影石出產地當非兵庫縣，而為山口縣。

6 林衡道、邱秀堂，〈台灣神社空留兩對獅子〉，收入《臺灣風情》，頁8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

7 同樣的見解亦見於tamano的網路日誌—二二八公園，石獅的秘密http://www.wretch.cc/blog/tamano&article_id=8580671（2007/06/16）

8 圖見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2003年，頁289。

除園內天后宮，並於天后宮原址北側興建「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即今之國立臺灣博物館前身；一般咸認今日二二八公園內散落之許多石柱珠為臺北天后宮舊物（圖1）。

而今二二八公園內之急公好義坊為清廷為了表揚貢生洪騰雲捐建考棚之義舉而於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石坊為四柱三間之形式，其前有一對短欄柱獅，今其旁並陳列著一對連座大型石獅（圖2）。查急公好義坊本位於西門附近的石坊街，約當今衡陽路上，因日治時期市區改正而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拆遷至現址；據拆遷前之老照片顯示，⁹該石坊除短欄柱獅外，別無大獅之存在，也因此該大獅之來歷格外啟人疑竇。

前人多以為該獅為原清代臺北府署之石獅，如林衡道編審之《臺灣古蹟全集·第一冊》載：「急公好義坊，……，坊前左右各有大小石獅一對，是當年臺北府署門前的石獅，石獅身體瘦長，雕藝頗為不俗。」¹⁰然將此石獅與臺北府署老照片相比照¹¹，即可發現形貌不符。故網路上曾引起一番熱烈討論，筆者原先從時間點與地緣推測此獅之來歷可能為臺北天后宮舊物，而網路上亦有許多網友與筆者所見略同，但卻一直未見臺北天后宮老照片中有確切石獅存在之身影。¹²

9 圖見李乾朗，《台灣建築史》，台北，北屋出版事業，1979年，頁173。

10 關山情主編，《臺灣古蹟全集·第一冊》，台北，戶外生活雜誌社，1980年，頁153。

11 圖見李乾朗，《台灣建築史》，台北，北屋出版事業，1979年，頁204。

12 當時筆者的意見為：「臺北急公好義坊旁石獅現置於228公園內，坊間部份刊物以為為原臺北府署石獅，然與老照片相驗，不符。查228公園建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原名臺北公園，大正二年（1913）為紀念兒玉總督設其塑像，並拆除原於園內之天后宮，改建今之臺灣博物館，現園內仍可見到許多天后宮遺存的柱珠。無論在時間點上（急公好義坊於1909年因日本政府拓寬道路，遷移至園內），地緣上，或是形制風格上（臺北天后宮起建於1888）都很接近；故筆者大膽地推測，此對石獅極有可能是原臺北天后宮之建物。」此意見曾發表於網路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366.html#note1>（2006/5/02）。



圖3、日治時期臺灣神社明信片中鳥居前母獅，翻攝自國家圖書館編《映像台灣系列1：日治時期的台北》，2007年，頁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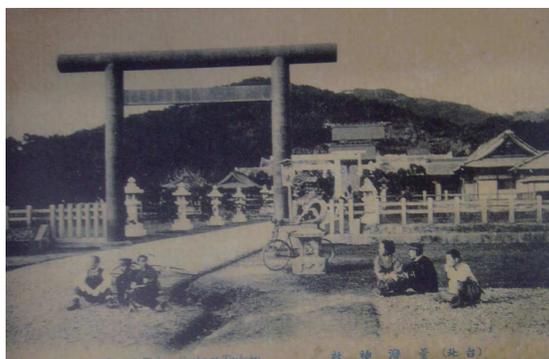


圖4、日治時期臺灣神社明信片中鳥居前公獅，翻攝自國家圖書館編《映像台灣系列1：日治時期的台北》，2007年，頁255。

直到筆者見到《映像台灣系列1：日治時期的台北》書中刊載臺灣神社此二張老照片，但見臺灣神社拜殿前三重鳥居前立有石獅一對，左公右母，軀幹與神道中軸平行呈「1 1型」擺設，與臺灣習見之傳統石獅擺置無異；公母俱開口，而公獅彩帶繫結，少獅與母獅相依，俱與今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肖似，而其下的櫃台除櫃台腳下沿部分被柏油路面遮掩外，石櫃台內的裝飾圖文亦完全相同。為求慎重與科學起見，筆者將今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大石獅對照《映像台灣系列1：日治時期的台北》該二圖攝取相同之角度後，以Photoshop軟體將之去邊及透明淡化，再疊附於臺灣神社前「石獅」之老照片上（圖7、8），發現其輪廓、長寬比例、裝飾圖文與櫃台線腳俱皆完全一致，尤其是巾帶與少獅等鏤空深淺分明處最為明顯；即便是同一位匠師所雕造之相似石獅，無論其技術如何老練純熟，以手工打製之藝品絕無可能如此分毫不差；故至此應可證明臺灣神社該舊獅與今急公好義坊旁石獅非常有可能同為一物，同時也推翻了該獅為臺北天后宮舊物之假說。

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從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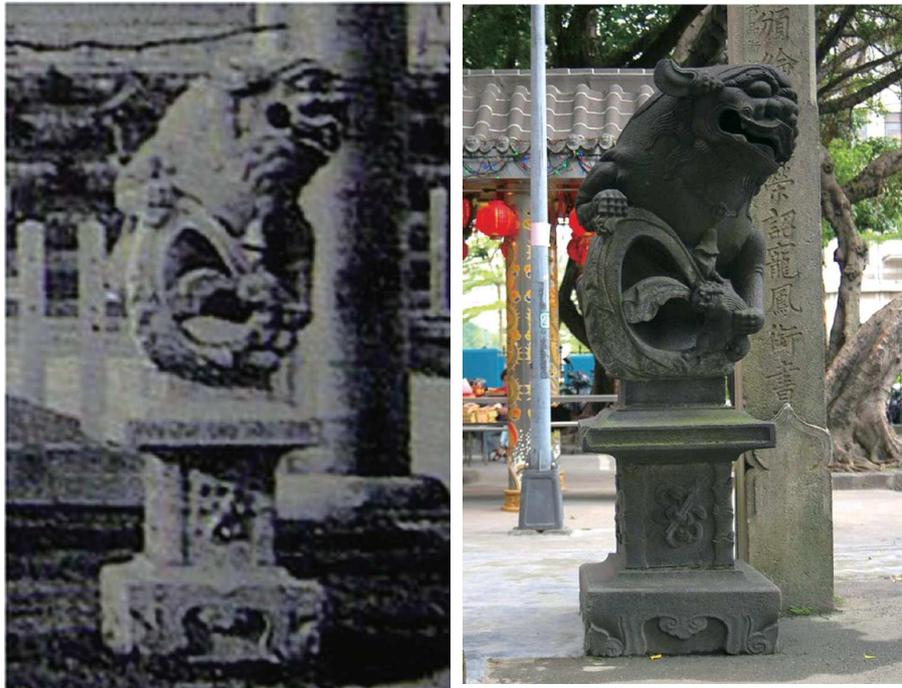


圖5、明信片「臺灣神社」母石獅與急公好義坊旁母石獅



圖6、明信片「臺灣神社」公石獅與急公好義坊旁公石獅





圖7、急公好義坊旁母石獅與明信片「臺灣神社」母石獅影像套疊相符



圖8、急公好義坊旁公石獅與明信片「臺灣神社」公石獅影像套疊相符

三、急公好義坊旁石獅是否即臺灣神社1901年板橋林家捐獻物？

至此雖可認定急公好義坊旁大獅很可能即為原臺灣神社石獅，但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即它又會是臺灣神社三對獅子中的哪一對呢？現位於圓山飯店廣場前之石獅（圖11、12），論者每多從前引林衡道之說，贊同圓山飯店廣場前石獅為清末板橋林家新大厝舊物，¹³然筆者卻抱持著不同的意見。主要理由有三：

13 如李榮聰，〈日治時期臺灣的神社狍犬建置變革之探討（上）〉，《台灣文獻》57卷2期，2006年6月，頁283 - 288。

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從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說起



圖9、急公好義坊旁母石獅為臺灣傳統「11型」擺設，頭往主體建築中軸翻轉內視



圖10、急公好義坊旁公石獅為臺灣傳統「11型」擺設，頭往主體建築中軸翻轉內視



圖11、圓山飯店母石獅原為神社狛犬常見之「一一型」擺設，頭往主體建築中軸翻轉外視



圖12、圓山飯店公石獅原為神社狛犬常見之「一一型」擺設，頭往主體建築中軸翻轉外視



1、石獅擺設之方式

圓山飯店前石獅明顯為遵循日本神社狛犬擺設方式「一一型」所製。¹⁴而日本狛犬與臺灣傳統石獅除造型上的差異，最大的歧異處常在於擺設的方式不同。臺灣石獅一般皆於建築物入口處之兩側，頭朝外尾朝內地面迎來客，且頭略向內側轉，此即李榮聰先生所謂之「1 1型」。而日本狛犬除上述擺設方式外，最為常見的是將身體側放，公母相對而視或頭部向門外扭轉之方式，即李榮聰先生所謂之「一一型」。而此一「一一型」的擺設方式，¹⁵在筆者三百對臺灣傳統石獅的田野經驗所見，在清代時絕無此例；因若依臺灣傳統石獅擺設方式，即身軀與建築物中軸平行，頭向內側翻轉的話，則此對石獅反倒公母錯位，試想光緒十四年（1888）臺灣尚為清領，圓山飯店該獅若真為板橋林家新大厝舊物，其造型擺設豈有與臺灣慣習相悖且彷彿能預知後事之理？

反觀急公好義坊旁大獅左公右母為「1 1型」之擺設造型，符合臺灣傳統石獅陳設之慣例。

2、石獅之造型風格

再者，圓山飯店廣場之石獅，其頭角突兀崢嶸、細部刻工依賴大量說明性的平板線條、公獅彩帶串有雙錢、¹⁶耳朵成扇型摺紋的招風耳、尾毛分叉五束皆鏤空未貼實身軀等特徵，皆為臺灣日治時期閩南系統石獅流行的主要樣貌，似非清代石獅之風格。以筆者田野經驗而論，日治時期臺灣石獅的造型，是經歷清初、清中、清末，雕工造型由「渾厚圓暢」、「矯作銳化」、再進而「瑣碎制式」的風格基礎上變本加厲而成，亦約當於何培夫先生所

14 「11型」、「一一型」之稱謂，沿自李榮聰〈日治時期臺灣的神社狛犬建置變革之探討（上）〉。

15 現圓山飯店前石獅於臺灣神社之「一一型」擺置，可參見臺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老臺灣素描網站http://www.sinica.edu.tw/photo/subject/2_temple/，屏東內埔皇國農民學校生徒於臺灣神社之合照。

16 石獅彩帶造型演變與傳統石獅由簡入繁的趨勢相一致，年代愈晚，巾帶的雕飾也愈趨繁複，如摺紋的描寫增加、巾帶打結的裝飾味變濃等。以筆者田調的三百對臺灣石獅為例，有確切年代者目前以北港朝天宮三川殿安山岩門前公獅巾帶串雙錢為最早，其底座刻款為「明治庚戌年五月吉日置」，時為明治四十三年（1910）。

提之「早、中、晚」之分類方式。¹⁷蓋因一項傳統包覆的一連串象徵符號和形象被人們繼承時，因人們各異的解釋而產生變化，成為一時間延傳的變體鏈。亦即後期的雕作可能保留若干前期之風格特徵，而前期雕作亦能隱約透露後來的面貌趨勢，但歷史的發展有其不可逆轉的順序，兩者絕不可能相互等同。



圖13、同治六年（1867）
景美集應廟安山岩
公獅



圖14、同治十三年（1874）
板橋慈惠宮安山岩公獅



圖15、光緒二十年（1894）
木柵集應廟安山岩公
獅

17 對於臺灣石獅的風格演變，可參照何培夫〈臺灣石獅的雕造〉，《臺灣的古蹟與文物》，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97年，頁52。已有一簡明的石獅沿革分析表，對於臺灣閩南系統之石獅的流變發行有一統整性的整理。



圖16、昭和三年（1928）學甲
慈濟宮青斗石公獅



圖17、昭和七年（1932）
嘉義彌陀寺安山岩公
獅（傳原嘉義慈濟宮
石獅



圖18、昭和年間原新莊神
社安山岩母狗犬

臺灣晚近石獅造型的演變因篇幅有限，僅能略舉一些有確切製作年代刻款的清末與日治時期之臺灣石獅相對照，以明其間之差異。在此以成於清末之景美集應廟三川殿門獅¹⁸（圖13）、板橋慈惠宮三川殿門獅¹⁹（圖14）和木柵集應廟三川殿門獅²⁰（圖15），和日治的學甲慈濟宮埕前獅²¹（圖16）、嘉義彌陀寺門樓前石獅²²（圖17）和新莊地藏庵山門前石獅²³（圖

- 18 景美集應廟清咸豐初年建立，同治年間遷至現址，主祀保儀大夫張巡，為安溪移民高姓所建的守護神廟宇。該公獅刻款為「同治丁卯年拾壹月吉置」與「大正甲子年」，可知其成於同治六年（1867），大正十三年（1924）重修時復將表皮別除。公獅長寬高為79×46×95（CM），母獅為80×49×94，連櫃台總高約138CM。
- 19 板橋慈惠宮主祀天上聖母，相傳起廟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該獅落款公獅為：「同治十三年春月穀旦」，母獅為：「龍邑林德和文記敬謝」。公獅長寬高為71×46×87（CM），母獅為73×45×88，其下櫃台為新物。
- 20 木柵集應廟主祀保儀大夫張巡，自景美集應廟分香所建。該公獅刻款：「光緒甲午年小陽春穀旦」，母獅：「峰上鄉弟子王□□□」。公獅長寬高為71×56×86（CM），母獅為77×58×84，連櫃台總高約126CM。
- 21 學甲慈濟宮石獅位於廟埕，獅身為青斗石，櫃台為花崗岩。公獅銅錢刻款「昭和戊辰」。
- 22 嘉義彌陀寺現共存三對石獅，一為砂岩打製之嶺南獅，餘二對造型、款識相類，應來自同一出處，可能為日治時期拆廟自他處遷移而來。磐牌刻款為「西市屠畜舖敬獻」，公獅銅錢刻款「昭和壬申」。公獅長寬高為74×54×88（CM），母獅為79×48×88，其下櫃台已佚。
- 23 新莊地藏庵山門對獅與其後石燈籠皆原為新莊神社遺物，採神社狛犬常見之「一一型」擺設。石獅刻款為「新莊保甲民一同」、「奉獻」，公獅銅錢刻款「昭和寶」。公獅長寬高為146×64×115（CM），母獅為135×66×120，連櫃台總高約230CM。

18) 相較，即可發現日治時期臺灣傳統石獅一方面繼承了清末石獅之大樣，另一方面也發展出更加繁複的裝飾，許多部位皆受到線條的擠壓圍囿而變形；如石獅面部的裝飾越趨繁雜，眉心、鼻頭、顴骨等處都逐漸形成一個個隆起的團塊，致使五官相互地推擠而變形。從早期渾圓的眼睛逐漸壓縮為梭子形，一體成形的鼻子也漸漸瓜分為數個團塊，並橫向延伸；嘴型從簡單的一字形變為下彎弧形再變為八字型；頭頂的鬣毛越趨於擁擠尖凸等等。²⁴此外在裝飾上，項飾由簡潔的鈴鐺轉為繁瑣造型之花朵及磬牌，公獅的巾帶由結飾轉換為赤裸裸的財富象徵：銅錢等，亦皆明顯與前期不同。

而若將急公好義坊旁大獅同圓山飯店前石獅與上述清末和日治時期之石獅相比驗，即可發現急公好義坊旁大獅造型近似於清末之石獅，較為簡潔圓順；反之圓山飯店前石獅則近似於日治之石獅，雕線較繁密且裝飾誇張。

3、文獻資料考證

正因對圓山飯店前石獅具有「一一型」的擺置型制與日治以後的造型雕工此兩點特徵，故即便是板橋林家後人話林家，筆者仍不敢置信；並進而懷疑有無可能為張冠李戴之誤，即板橋林家捐獻予臺灣神社之石獅，並非圓山飯店前的這對，而另有其獅呢？因劍潭公園前原臺灣神社花崗岩大獅子具有鮮明的「日本狛犬」造型特徵，²⁵故不可能為清末板橋林家所有。因此現在必須確定的是二二八公園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與圓山飯店前石獅，到底哪一對才是板橋林家所捐獻的呢？

查日治時期總督府檔案記載，臺北縣擺接堡板橋街林本源曾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9月6日向臺北縣提出捐獻給臺灣神社的一對石獅子，9月13日臺灣神社函覆同意，並於9月30日向臺灣總督府陳報，公文中並附有手

24 在晚近的其他石作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諸如龍柱或麒麟堵之面部亦與石獅發展相類，從此亦反應出台灣晚近傳統石作具有共通的走向與趨勢。

25 日本狛犬主要典型為一阿一吽，身軀橫置成「一一型」，前肢打直撐立後肢蹲坐，尾毛呈尖峰狀。劍潭公園入口處之原臺灣神社石獅即具有上述特徵，並與總督府檔案內林家捐獻石獅之圖稿相差甚遠。

繪圖稿及其尺寸（圖19）。²⁶觀此圖稿可發現該石獅手繪稿並未完全照實描寫，如圖中左右兩獅皆腳踏繡球、巾帶串雙錢，不管與圓山飯店前石獅或急公好義坊旁石獅相較皆有所出入；如急公好義坊旁石獅（圖20、21），公獅前足踏繡球，巾帶作結飾狀，母獅擁少獅；而圓山飯店前石獅據日治時期老照片顯示為「一一型」之擺設方式，左邊之公石獅串雙錢，²⁷右邊之母石獅依少獅（圖22、23）；且該圖櫃台當中的裝飾圖文，皆擬吉祥物與飄帶纏繞狀，亦與兩者實際有若干落差。但總體而言，該圖所描繪的石獅造型較為圓順，其各部位特徵與其下櫃台裝飾，皆更近似於急公好義坊旁之石獅；反觀圓山飯店之石獅，不但整體造型較枯硬僵直，其下之櫃台亦與圖繪相去甚遠。

如急公好義坊旁石獅之櫃台（圖24），櫃台腳內縮彎起，束腰轉角飾以竹節柱，其實際四面的裝飾圖紋為：公獅，前方櫃台雕飾棋盤、飄帶，後方塵尾、飄帶，外側面飾畫、飄帶，內側面飾花鳥；母獅，前方櫃台雕飾畫、飄帶，後方如意、飄帶，外側面飾書、飄帶，內側面飾花鳥；不管是其櫃台角或束腰處裝飾皆與圖稿有幾分形似。而圓山飯店前石獅之櫃台（圖25），四面俱素毫無裝飾，櫃台線腳亦與圖稿殊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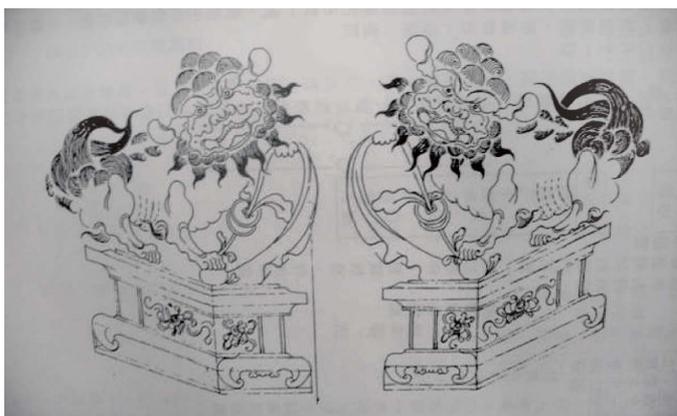


圖19、總督府檔案第630冊第254頁附板橋林家捐獻臺灣神社石獅圖稿

26 溫國良編譯，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五）宗教系列之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宗教史料彙編》明治三十四年至明治三十五年八月，頁133 - 136。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年5月。

27 左右之分際以人居於建築主體向外望為準。

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從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說起



圖20、急公好義坊旁公獅



圖21、急公好義坊旁母獅



圖22、圓山飯店前母獅



圖23、圓山飯店前公獅



圖24、急公好義坊旁母獅櫃台



圖25、圓山飯店前母獅櫃台



此外該圖稿並詳附尺寸如下：

獅身高三尺六寸五分

座三合、高三尺二厘 計高六尺六寸七分

邊面橫長四尺一寸

正面橫長三尺五分

側面

座長三尺一寸二分

座寬二尺一寸四分

正面

石獅因為立體圓雕，長寬丈量不易拿捏，故在此僅以獅身高、石獅連座高與台座長寬作比較。經換算圖稿記載該獅身高三尺六寸五分為110.61公分，全高六尺六寸七分為202.12公分，座長三尺一寸二分為94.55公分，座寬二尺一寸四分為64.85公分。²⁸而急公好義坊旁石獅尺寸，以公獅為例，獅身高120公分，兩者誤差9公分多；連座全高207公分，兩者誤差5公分多；台座側面長107公分，兩者誤差12公分多；台座正面寬69公分，兩者誤差4公分多。圓山飯店石獅，以公獅為例，獅身高149公分，兩者誤差39公分多；連座全高235公分，兩者誤差34公分多；台座側面長136公分，兩者誤差41公分多；台座正面寬86.5公分，兩者誤差21公分多。可見實際尺寸亦以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較接近文獻之記載。

28 此長度為台尺換算公分至小數點第三位四捨五入之結果。



圖26、日治時期臺灣神社戳記「臺灣神社大祭紀念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之明信片可見鳥居、石獅、玉女石像、揭示所、木燈籠，相關分佈位置與擺設方式俱與（圖3、圖4）同

且（圖四）之臺灣神社老明信片據「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日治時期圖像寫真藏品資料顯示，該明信片發行年代約1910年；²⁹以此參附筆者收藏之日治時期臺灣神社明信片（圖26），其上蓋有「臺灣神社大祭紀念，明治四十年〈1907〉十月二十八日」之戳記，以及「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老照片系統識別號0000557915明治三十七年（1904）《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紀念帖》老照片，³⁰與同網站系統識別號0000559175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大正元年（1912）出版之《臺灣鐵道案内》等老照片；³¹其中石獅之

29 「國家圖書館台灣記憶網站」中系統號000362252臺灣神社明信片，年代註記為「1910年代」。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image_photo_detail.hpg&project_id=twpt&dtd_id=10&xml_id=0000362252&subject_name=%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8%87%ba%e7%81%a3%e5%9c%96%e5%83%8f%e5%af%ab%e7%9c%9f

30 「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老照片系統識別號0000557915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出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紀念帖》，明治37年4月出版，頁1。http://nrch.cca.gov.tw/ccahome/photo/photo_meta.jsp?xml_id=0000557915

31 「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老照片系統識別號0000559175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出版《臺灣鐵道案内》，大正元年出版，頁91。http://nrch.cca.gov.tw/ccahome/photo/photo_meta.jsp?xml_id=0000559175

身形相近，並都為「1 1型」擺設方式，相關物件之分佈位置亦皆一致，如皆位於拜殿前第三重鳥居之前，鳥居其左設有「下乘札」，鳥居其右有「揭示所」，兩旁有「木燈籠」，前方有仙童玉女石像³²等等，在在顯示該獅在1910年以前便已存在於臺灣神社。

再從後來的一些老照片相比對，可見該獅之相關位置曾經多次的變動。如筆者收藏之日治時期臺灣神社明信片中（圖27），相同位置已不可見今急公好義坊旁石獅；另一張明信片（圖28）中則可見今急公好義坊旁大獅曾位於今劍潭公園石獅前；「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系統號0000362253之臺灣神社老明信片中，可見該獅既不在鳥居前，也不在劍潭公園石獅前，劍潭公園石獅前替換為仙童玉女像；³³「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0544852昭和十年（1935）《躍進臺灣》老照片，相同之位置卻僅見今劍潭公園石獅，已不可見今急公好義坊旁大獅與仙童玉女像了。³⁴故此獅後來的位置與流向尚待更多的文獻來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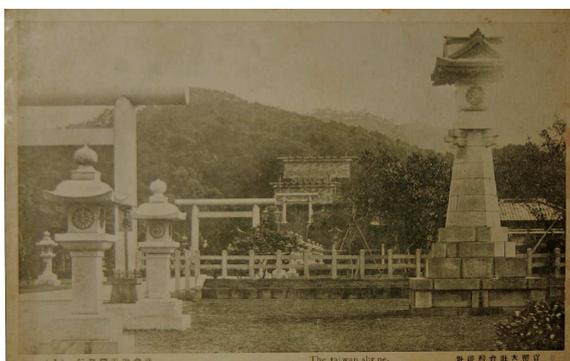


圖27、另一張臺灣神社明信片中同一位置已不可見石獅之身影（筆者藏）



圖28、日治時期臺灣神社明信片中可見急公好義坊大獅曾位於劍潭公園石獅前，呈「11型」擺設（筆者藏）

32 據《臺灣神社誌》頁115載，該對仙童玉女石像為明治三十五年（1902）九月十三日由大稻埕湯和尚奉獻。

33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系統號0000362253老照片http://memory.ncl.edu.tw/tm/cgi/hypage.cgi?HYPAGE=image_photo_detail.hpg&project_id=twpt&dtd_id=10&xml_id=0000362253&subject_name=%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8%87%ba%e7%81%a3%e5%9c%96%e5%83%8f%e5%af%ab%e7%9c%9f

34 「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老照片系統識別號0000544852臺灣通信社出版《躍進臺灣》，昭和十年，前置面1。http://nrch.cca.gov.tw/ccahome/photo/photo_meta.jsp?xml_id=0000544852

綜合上述諸點，再對照《臺灣神社誌》中石獅設置時間，則此獅來歷當以明治三十四年（1901）9月13日板橋林本源捐獻最為合理。故筆者以為，板橋林家捐獻予臺灣神社之物並非圓山飯店廣場前之石獅，而實為急公好義坊旁之石獅。由是又引發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圓山飯店前的石獅假若不是板橋林家所獻，那它又會是哪裡來的呢？



圖29、將（圖28）日治時期臺灣神社明信片之石獅與今急公好義坊旁大獅以Photoshop套疊相符

四、劍潭公園入口處石獅

據明治四十年（1907）10月30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雜報「獻納之石燈籠」條載：

與故宮殿下有關係諸家。製造石燈籠二十七基。欲進呈于臺灣神社。既屬如所報。聞其製式皆一定。模型係倣照平安神宮中門所立

者。極其高尚古雅。石質則取山口縣德山產之花崗石。其石匠前年曾為陸軍幕僚製造大獅子。獻納之于臺灣神社。近因落合赤間神社宮司之篤志。復執監督之勞。故使此熟手之石匠為之。其告竣當在本年十一月上旬也。³⁵

文中所述「石質則取山口縣德山產之花崗石。其石匠前年曾為陸軍幕僚製造大獅子。」皆與《臺灣神社誌》中記載明治三十五年7月13日在臺灣陸軍高等官敬奉石造獅子之訊息相合。且圓山大飯店廣場前石獅、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與劍潭公園入口處之此三對石獅當中，惟有劍潭公園入口處之石獅（圖30、31）材質為花崗岩，其餘兩對俱為臺產安山岩所製成。因此現劍潭公園入口處之石獅，當即為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臺灣陸軍高等官聘請日本匠師所雕獻的「大獅子」；故文中「前年」一語，似未可看實為明治三十八年（1905），當意指明治四十年（1907）以前。

且據《臺灣神社誌》載，明治四十年（1907）以前，臺灣神社所有之石獅僅明治三十四年（1901）板橋林家與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臺灣陸軍高等官所獻之兩對；再參附「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系統識別號0000544852明治四十三年（1910）《臺灣館》老照片中已可見今劍潭公園石獅之身影，³⁶證明該獅在1910年前便已存在，更加說明此獅很可能即為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臺灣陸軍高等官所奉獻。

35 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1907）10月30日，第二千八百四十八號，第五版。

36 「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老照片系統識別號0000534516：吉井弘治《臺灣館》，明治四十三年，頁5。http://nrch.cca.gov.tw/ccahome/photo/photo_meta.jsp?xml_id=0000534516

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從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說起



圖30、劍潭公園入口處原臺灣神社吽型獅子身軀具狗犬常見之毛旋紋



圖31、劍潭公園入口處原臺灣神社阿型獅子尾型呈尖峰狀

五、臺北圓山大飯店廣場前石獅

昭和十九年（1944）一架日本客機在松山機場降落失事而撞上劍潭山，將神社建築部份燒毀。³⁷光復後，國民政府便將臺灣神社原址改建為「臺灣大飯店」，民國四十一年（1952）改名為「圓山大飯店」。³⁸而臺灣神社之陳蹟也就在這過程中被消磨湮沒，廣場花圃前的這對石獅，可說是臺灣神社原址上少數僅存之信物。惟原先之「一一型」擺設，也已被改換為傳統之「11型」擺設了（圖32）。

37 昭和19年（1944）臺灣神社剛升格為「臺灣神宮」。並預定於同年12月舉行鎮座祭，不料10月25日，一架民航機在臺灣神宮附近的劍潭山墜毀，撞毀了才剛完工的臺灣神宮。是時為二次大戰末期，日本處境日艱，故已無力再修復神宮。次年，便戰敗投降。

38 參考「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網站」http://www.sinica.edu.tw/~photo/subject/2_temple/index.html



若上述對臺灣神社二對石獅之考據皆可成立的話，則由刪除法可以得知，臺灣神社的三對獅子中尚未確認來歷的，僅餘圓山飯店廣場前的此對石獅；故其極可能為臺灣總督石塚英藏於昭和五年（1930）12月28日所敬獻予臺灣神社之石獅。

就文獻資料來檢驗，也可發現此獅出現的年代稍晚，在1910年以前之臺灣神社舊照片中，筆者至今尚未發現此獅之身影，而多集中於日治後期。如昭和十三年（1938）1月內埔皇國農民學校修學旅行合影之老照片³⁹，以及《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書載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第十八回學生在戰時體制國民總動員及皇民奉公運動的號召下至臺灣神社祭拜之合影，⁴⁰皆可見該獅左公右母呈「一一型」擺設。

恰巧李榮聰先生發表於《臺灣文獻》之〈漫談兒玉神社與台灣百年因緣〉一文，揭露了位於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江之島崇祀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之兒玉神社當中，亦有石塚英藏於同年敬獻的獅子一對。查該獅身軀靠近神道中軸一側之底座刻款為「昭和五年十一月」，尾端底座處刻款為「石材產地臺灣臺北州觀音山」，由造型觀之，其雕造亦出自於臺灣石匠師之手。⁴¹

而若將此對石獅與今圓山飯店廣場前石獅相比對，即可發現雖然兒玉神社該對石獅雕琢裝飾更為繁密，如項頸處繫磬形牌飾，櫃台四面俱有雕花，以及為「1 1型」擺設方式等不同處；但整體而言，兩



圖32、圓山大飯店前石獅戰後更替為「11型」擺設

39 參見「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網站」http://www.sinica.edu.tw/~photo/subject/search/life02_pic01.html

40 參見林文龍《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年，頁233。感謝李榮聰先生提供資訊。

41 請參見李榮聰，〈漫談兒玉神社與台灣百年因緣〉，《臺灣文獻》57卷4期，2006年12月，頁470 - 478。

者間的雷同處遠多於歧異處。首先兩者設置的時間點即十分接近（兒玉神社：昭和五年十一月；臺灣神社：昭和五年十二月），且材質俱為臺北觀音山所盛產的安山岩，而該獅造型亦皆為日治時期臺灣石獅所流行之樣貌特徵，即充滿著制式硬邊的線條、突顯誇張變形的五官、承受擁擠紋樣的寬矮身軀、公獅彩帶處皆串雙錢及穿鑿露空處增多等等。

尤其在細部的刻劃上，兩者有很高的同質性，如頭髮皆十分尖凸、耳朵皆有扇形褶紋、四肢指節擬人有骨感、巾帶翻褶扭結之情狀肖似、公獅尾端皆刻有陰囊性徵，以及尾鬃分五束皆鏤空，三長兩短，短尾鬃盤附於長尾鬃等特徵俱同（圖33、34）；此外櫃台亦皆非一體成型，而分上、中、下三層組合而成，除細部雕飾不同外，大體一致。故筆者推測，此二獅除皆為臺灣總督石塚英藏所奉獻外，並於同一時期委託同一批匠師打造的可能性相當高。

可惜的是該獅並未留下任何落款，不過筆者懷疑原本是有落款的，但政權交替後將便將這段史跡磨滅了；尤其是更建自臺灣神社原址之圓山大飯店，在威權時代便為具濃厚政治宣傳意味之重要地標，當然更不可能容忍有代表日本統治政權之確切痕跡出現。如神社獅子櫃台一般其間多會鑄刻「奉獻」等字款，然該獅櫃台四面平整光滑、一無所有；此外該石獅正面底座與巾帶交接處有一內削之橫斷線（圖35），石皮紋理也與他處有異，極不自然，可能為抹除字款而向內斬斷；蓋一般習慣多以一條細線交代收邊即可，如急公好義坊旁大獅、圓山飯店石獅尾部底座與日本兒玉神社臺灣總督石塚英藏捐獻之石獅皆是。例如現位於圓山兒童育樂中心之原臺灣神社石燈籠，⁴²其燈籠柱身「竿」，便鑄刻有一倒「T」字型之凹槽，可能是為了銷除日治紀年刻款使然；然而如今文史無徵，也只能忖之了。

42 參見「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0519）：劍潭公園、臺灣神社遺跡」<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19/tony0519.html>



圖33、圓山飯店前公獅正立面



圖34、圓山飯店前公獅背面飾陰囊



圖35、圓山飯店石獅正面底座與巾帶邊緣切線古怪



圖36、圓山飯店同一石獅底座有三種形式，後為素平，兩側為邊框內減地平鉞，前為內削

六、結語

在田野探查的過程中，沒有年代刻款的石獅標本十之七八，往往必須借重歷史學與藝術學圖像分析等研究方法，以貫時性與共時性之縱橫交錯分析

配合文獻史料，來探討臺灣石獅工藝之傳承與演變。而二二八公園急公好義坊旁之石獅，即為筆者五年前千里之行的起點，也是第一對紀錄的獅子；希望本文能對其歷史淵源之釐清略有助益。

同時，本文的書寫僅提供一個新的觀點，尚有許多疑問留待解答；如急公好義坊旁大獅若果為臺灣神社中板橋林家捐獻的石獅，那它又是何時及為何會遷落在二二八公園內呢？期待日後能有更多的文獻資料出土來駁反、辨正。

